

京文史资料

第52辑

○难忘的军事译员生活○威武不能屈
的梅兰芳○忆先父宋哲元○记傅泾波
的一次秘密北平之行○大鹰篇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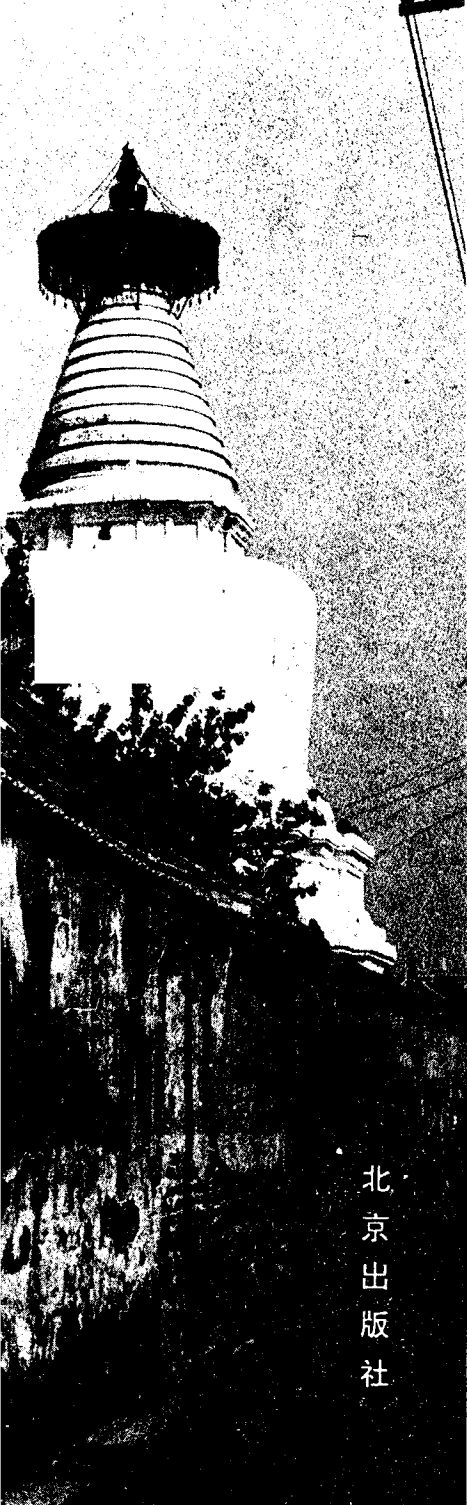
北京文史资料

甲石题



第五十二册

北京出版社



北京文史资料

BEIJING WENSHI ZILIAO

第五十二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77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00-02788-x/k·296

定价:7.90元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

- | | | |
|-----|----------------------------------|-----|
| 1 | 难忘的军事译员生活 | 翁心钧 |
| 48 | 译员生活七百天 | 华人佼 |
| 68 | 缅北战场五百天——一个随军译员的回忆 | 傅书逸 |
| 78 | 威武不能屈的梅兰芳 | 梅绍武 |
| 85 | 忆先父宋哲元 | 宋景昭 |
| 100 | 镌刻在我们心中的无字碑
——缅怀何万生烈士和他的革命老妈妈 | 安捷 |
| 108 | 惶惶岁月 度日如年 | 刘远英 |
| 113 | 日寇铁蹄下的童年经历 | 盛鸿蕴 |
| 118 | 鞠躬 混合面 “献铜献铁” | 白宝华 |
| 121 | 记 1944 年 5 月市立一中大逮捕 | 张瑞平 |
| 125 | 铁蹄下的清河制呢厂工人 | 赵书 |
| 131 | 日军侵华期间在北平西郊建立的
忠灵塔与靖国神社 | 关续文 |
| 134 | 日伪时期北平城里的“爱护村” | 陈德光 |
| 137 | 1940 年北平日本军官被刺真相 | 王国华 |
| 140 | 沦陷时期北平日侨囤积掠夺物资情况点滴 | 阿尚 |
| 143 | 挨户行乞的日本侵略军 | 刘金生 |
| 145 | 抗日战争中的一股逆流
——记傅泾波的一次秘密北平之行 | 于国勋 |

· 居京琐忆 ·

- | | | |
|-----|--------------|-----|
| 151 | 大鹰篇 | 王世襄 |
| 185 | 老北京的街头巷尾 (二) | 翟鸿起 |
| 216 | 王世襄先生来函 | |

· 补 白 ·

- | | | |
|-----|-------------|-----|
| 124 | 吴昌硕“戒烟诗” | 傅耕野 |
| 130 | 张学良为东北义勇军捐款 | 尹崇斌 |
| 133 | 听课琐忆 | 高景成 |
| 215 | 北大红楼旧事 | 高景成 |

北京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西小院

邮编：100031

电话：6055813 6050524

本期发稿编辑：秦 薇 刘宁勋

难忘的军事译员生活

· 翁心钧 ·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是1943年底，昆明译员训练班结业后，同学即将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前，陶愉生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的几句宋词，充分表露了当时大家在即将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前，既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光阴荏苒，半个世纪过去，当时风华正茂的少年，今已皤然白发。回首往事，深觉颇有可记之处，爰将当时的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睹尽可能地回忆记录下来，以纪念梅贻琦校长号召西南联大同学参加译员工作和滇西反攻50周年，也为这一阶段历史提供一些真实的素材。

梅校长的号召

1943年暑假后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二年级读书。联大工学院设在昆明城东拓东路上的迤西会馆内，与位于昆明西北角，大西门外

的校本部相距三公里许。那年的11月9日上午，在上完第二节课后，听说梅贻琦校长来到工学院，正在会馆前院对同学们讲话，于是我也挟着书跑去听。面目清癯的梅校长站在庭院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向站在四周的同学们作动员参加译员工作的报告。报告内容大致是：“抗战已经进行了六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也已快两年。在过去的一年中，盟国已经由退却转向进攻。欧洲战场方面，苏联自斯大林格勒大捷后已将战线推进至基辅一线；英美联军则继北非大捷后已在意大利半岛登陆，使德国法西斯陷入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境地。太平洋战场方面，美军采用越岛战术也已取得完全的主动权。唯独在中国战场上我们仍然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缺乏武器和弹药。现在美国已经空运来大量的军火装备，并派了大批教官来华训练中国军队使用这些武器，仅在昆明一地就集中有5000名美军官兵，其中许多人已到达数月之久，但是由于缺少翻译人员而无法开展工作，不少人因此行将调往其他战区。其实我国的大中学校每年都培养出许多懂英语的人才，而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中国大学的耻辱。”他号召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译员工作，并宣布校务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大意为：“凡是应届毕业班的学生，下学期的课一律免修，但必须服一年以上兵役，取得证明后方能发给文凭。毕业班学生立即参加译员工作的，工作满一年可发给毕业文凭。非毕业班的学生在参加一年译员工作后返校复读的可以免修12个学分。”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曾有规定，中等以上学校的在校学生一律免服兵役。西南联大的这一决定开了大学生须服兵役的先例。两个月以后，教育部对全国的所有大学作出了完全相同的规定，但还附加一项优惠条件，允诺在抗战胜利后，选送一定比例的曾参加一年以上译员工作的学生出国留学。因此，1944年大后方的应届毕业生，大部分都加入到译员队伍中来，还有小部分则分散到其他的军事部门中工作。

梅校长的动员报告在工学院的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好像在一泓平静的池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使得多年来深埋在青年学生中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一下子爆发出来，一时在寝室内、食堂中，谈论的无一不是这个话题。我在经过了两个不眠之夜后，一个人悄悄地到施嘉炀院长处报了名。通过简单的笔试，很快就公布出第一批进入译员训练班的名单，这才发现不少要好的同学均榜上有名。这一批参加译员工作的联大同学共有 60 余人，其中半数来自工学院，约占当时全院学生的十分之一强。二年级参加者特多，机二除我之外还有梅祖彦（梅校长之子）、冯钟辽（冯友兰之子）、姚元、陶学祁和李宏；电二有傅书遄、高延年、吴国铨、项一飞、汪弘和张祖培；航二有樊恭休、蒋策。另外我中学时同学，在新校舍化学系二年级的陶愉生（陶孟和之子）和华人佼也同期参加译员工作。我们这批人于 11 月 14 日集体入昆明译员训练班报到，从而离开了校园，开始新的生活。

昆明译员训练班

昆明译员训练班设在原农校旧址，位于西南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以西不远的黑林铺，它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一个干训班，至此改由联大经办，易名为昆明译员训练班。班主任由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兼，具体班务则由几位联大教授负责，他们是社会系教授吴泽霖，经济系教授戴世光，地理系教授鲍觉民和政治系教授樊际昌，都是英、美留学生。我们这一期是第一期，在我们报到之前班内已经有了 20 余名学员，他们都是从云南以外的省分招收来的，其中有一些是珍珠港事件后从香港流亡到桂林一带的知识青年。我们入班后又陆续招进 20 余人，他们比我们后结业分派工作。所以第一期总共培训出 110 名左右的译员。

培训班内的生活管理和大一时差不多，由教官负责。学员编

成十余人的小组，清晨起床后整理内务，盥洗，然后由教官集合，列队到公路上跑步。解散后先自修一小时再吃早饭，8时开始上课。课程以小组学习为主，每天上午有两节英语课，由一名联大外语系的助教辅导。两小时小组学习以外还有全体学员一起上的大课，主要由班外请来的人讲授，如美军总部曾多次派人来讲美军的兵种和组织概况，有关步炮协同、对空联络的知识等。步兵学校曾派来美国教官和译员做示范讲课，内容是机枪的种类和结构，教官利用挂图和实物，当场拆卸，讲述各零件的功能，有趣的是那位译员讲的和美国教官说的竟完全对不上号。炮兵学校也有人来讲课，介绍中国军队即将配置的37毫米口径战防炮，75山炮和105、155毫米榴弹炮。后来到台湾当上了“外交部长”的沈昌焕也曾来班里做过一次口译示范。译训班的副主任吴泽霖则作过题为“美国的民族性”的报告，说美国是由各种外来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大熔炉。联大还有不少其他教授来班里讲演过，如地理系教授张印堂讲滇西和缅甸横断山系的地理特征，历史系白俄教授葛邦福讲“战略与战术”，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和外文系主任莫泮芹则讲他们留美的趣闻。此外译训班曾组织全体学员去附近的步兵学校参观了一整天，详细听取对六种主要步兵武器（步枪、手榴弹、机枪、60迫击炮、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介绍，最后还进行过一次步枪打靶。

入班后没几天，一个晚上突然紧急集合，全体学员集中到大礼堂去。不一会儿，几位译训班负责人陪同班主任黄仁霖进来，把黄介绍给大家，然后黄仁霖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匆匆离去。后来知道那次他是陪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途经昆明特来看望同学们的。在那次开罗会议上中国被正式列入四强，这一消息在当时确实大为振奋人心。

译训班的课程计划六周结束，但由于工作急需，有十多名英语好的学员于12月上旬就提前分配了，机二同学陶学祁就是其中之一，被派往曲靖汽车学校。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已读过两年，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奔向内地，考入西南联大，他曾为昆明的一些电影院做过原版片的口译。

黄仁霖于最后一周又专程来到译训班，开讲“社交礼节”课程，从星期一开始共五讲，全部用英语讲述。黄生得仪表堂堂，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英语水平极高。由于他不用偏僻词句，可以很容易地听懂每句话，且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但是他所讲的内容全属上流社会的社交范畴，不但在中国无此客观条件，就是在美军中，从我以后一年零九个月的译员生涯看，也完全用不上。他的最后一讲是关于进餐时的礼节。那天恰好是圣诞节，他别开生面地请大家吃了次西餐，边讲述，边示范，边用餐。餐毕，译训班的学习也就结束了。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FAB）

1943年12月26日，外事局昆明办事处主任姚锴亲自来译训班接收毕业学员。经过简短的训话后，每人填写表格，然后依次领取一套用罗斯福布面料缝制的薄棉军装，一个佩在左胸前的布质“同上尉”符号和一个月的薪金，这样我们就正式成为外事局属下的三级译员了。外事局简称FAB（Foreign Affair Bureau的缩写），直属军事委员会。当时外事局局长是商震。昆明办事处主任姚锴的军衔是少将，据说他是中国军队中四名曾在美国军校毕业者之一，但他的举止谈吐给人以庸俗的感觉。两个月以后姚调离工作，昆明办事处主任由一位姓戴的少将接任。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姓名很难分清，所以每位译员都有一个外事局编号（FAB. NO.），这个号数就写在胸章上。记得当时我的编号为300多号。

随着不断地有译员离开，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对流水编号清理一次，剔除已离开的名字，让后面的依次提上来（符号却没有换过），所以半年后我的译员号已上升到200多号，而到日本投降时

已上升到 170 余号，新报到的译员则已 4000 号出头。译员和外事局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自从这次领取军装和符号后，就再也没有和它发生过直接的接触。

译员的工作由美军总部中的一位准尉副官巴顿负责分配。他对每一位译员都备有一张卡片，工作效率非常高。从他那里每人领到一张领货单，然后到美军仓库领取六样物品：行军床一张、军用方蚊帐一顶、军毯一条、内衣裤一套、不锈钢军用水壶一只和系挂水壶用的手枪腰带一条。这些物品除后两种外都是印度产品，质量不高。在外事局和美军总部的手续都办好后，我们搬到译训班和美军总部之间的译员站暂住，并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译员站是译员待命、中转或短暂停留的地方。我们这一期除傅书遄、张祖培等四人是分配去印度兰姆伽 (Ramga) 训练中心工作外，其余全部分配到云南省各地的美军单位。我和温广才、钱泽球、杨大龄、项一飞、汪弘六人（都是联大工学院的，温、钱、杨是机械系四年级的，另两位则是电机系二年级的）是最后一批离开译员站到曲靖汽车学校的。

曲靖汽车学校 (KATC)

曲靖位于昆明东北 160 公里，自古以来视为军事要地，明太祖喻之为云南之襟喉。由黔至滇的入侵者一旦占领了曲靖，摆在他面前的便只是坡度平缓的丘陵地区，昆明也就无险可守了。我们一行六人乘坐由美军中士驾驶的老式卡车于 1944 年 1 月 4 日上午 9 时离开昆明，下午 4 时左右便到达位于曲靖城以北大约三公里的曲靖汽车学校。

到了译员居住的楼前，一些老译员纷纷跑出来迎接我们，为首的是译员队长曾英，一位来自四川大学机械系三年级的少校衔二级译员，自汽车学校开办以来他就在此工作。另外还有 10 名译员：方敏、包德延、李书春、江矣、陶学祁、侯××和四名来自

香港的广东人黄永裘、黄福赐、关士光等。整个译员队占据了一幢营房的全部楼上，楼下便是汽车学校的教室。

曲靖汽车学校又称曲靖汽车训练中心，简称 KATC (Kutsing Automobile Training Center)，是当年为接收美援军用物资而设立的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下辖六个训练中心（或学校）中的一个。学校建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四周环以正方形的围墙，四个墙角设有放哨的岗楼。营房内驻有两个师的部队：东半部为中央军的第五军第 48 师，西半部为滇军某师。

鉴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低效率和有意识地保存实力用于战后打内战，美国政府对提供军援提出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大致是：只装备对日作战的第一线部队；接收美援的部队必须经过美军的训练；在使用美援的部队中还必须驻有美军联络组，监督美援物资的使用，防止被转移、中饱 and 流入黑市。这些条件是对其他盟国（英国和苏联）所没有的。蒋介石为要取得美援，最后只好忍气接受。

由于当时陆上交通线全被日军封锁，美援物资只能用双引擎运输机（C-46 或 C-47）飞越“驼峰”运来。这些飞机只能装运中型吉普车（正式名称是 3/4 吨 4×4 军用卡车）。少量美军自用的十轮卡车（正式名称 2½ 吨 6×6 军用卡车），只能拆卸后装上飞机，其车架大梁还需割成两段，运到后再焊接起来。所以在中印公路通车以前美援物资中没有卡车，只能利用国内现有的卡车组建汽车学校，这也就是为什么汽车学校不像其他五所学校设在昆明而设在曲靖的原因。曲靖汽车学校是利用第 5 军第 48 师汽车团的汽车和器材建立起来的。来到曲靖汽校学习的一批批中国官兵大多是已经掌握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的，他们被派来的目的主要是取得将来接受美援汽车的资格。

曲靖汽车学校下设三个部门，驾驶组、修理组和汽车修理厂。学校的中方负责人由 48 师师长郑庭笈兼，但具体工作均由美军承担，中方并不过问。整个汽车学校共有美军约 20 名，由迪特律少

校和瑞少校统领。迪少校原为汽车工程师，是学校的灵魂。瑞少校原是个汽车商人，大腹便便，对汽车的具体结构不十分熟悉，因此对学校事务也不大过问。3月中迪少校在华服役期满调回美国，校务就由瑞一人负责。迪在离开中国前，曾单人驾车沿滇缅公路观光一次。抗战初期，我国在没有筑路机械的情况下，发动民众在很短时间内修成了滇缅公路，美国人对此视为奇迹，非常佩服。迪少校看后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汽校的三个部门中以驾驶组规模最大，半数以上译员均在这个组中工作，为首的美军是托马斯中尉和劳中尉，下面有七八名士兵。修理组为首的是琼斯上尉。修理组下又分引擎和车架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各有两名美军士兵任教。修理厂的美方负责人是凡尔曼中尉。此外直接归两名美军少校领导的还有一位军士长（是上士中级别最高的），负责统率所有的士兵。汽车学校和其他几个训练学校一样，都是每期10周，两期之间休假四周，但汽车修理厂没有假期。

汽校的汽车修理厂

我们到达曲靖汽校后新的一期正要开始，我们中机四的三位同学被派在修理组工作，项一飞去驾驶组，汪弘和我则去汽车修理厂。修理厂规模不大，只能进行一些中修。工厂的中方负责人是位徐少校，下面有一名文书和十余名技术兵，美方的凡尔曼中尉大约30岁左右，高大粗壮，日耳曼血统，原来也从事汽车修理，熟悉业务，工作认真，待人和蔼，负责全厂技术工作。他手下有四名美国士兵。

由于汪弘和我开始工作时对汽车的结构一窍不通，过去又从未接触过有关汽车零件和各种修理工具的词汇，加上美国人讲话的发音和英语老师迥异，很难听懂，所以窘迫不堪，日子难过已极。幸好陶学祁也在修理厂工作，大部分事可以由他挡过去。这

样经过大约两个月的困难阶段，通过自身努力和陶的帮助才逐渐地适应了工作，这时陶也调走专任瑞少校的翻译。

修理厂中译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文书所开领取新汽车零件的领料单译成英文，经凡尔曼审核签字后仓库才能凭单发放。来曲靖前去美军仓库领取六样物品时，管理仓库的美军照单发放以后就随手将签过字的领货单一团丢入字纸篓内，这里也是如此。所以根本不可能进行事后的清点和查帐。这种情况下，供应部门中难免会发生贪污现象。在美军中，供应部门（Service of Supply，简称 SOS）的名声很臭，很多人称之为贪污部门（Service of Squeeze）。

汽车修理厂中的中国官兵生活很清苦，中饭时每人往往仅有十几粒盐渍黄豆佐餐。厂长徐少校喜欢吸烟，但也仅用废纸卷些劣质烟丝吸。凡中尉有时敬他美国香烟，其他美国兵也有时送巧克力给中国士兵，都往往遭到婉拒。这些事实在令人感动。

2 月底，昆明译训班第二期结束，又有 5 名译员被派来曲靖汽车学校，他们是联大机四的关崇琨、政四的彭某，复旦大学的何瑞镛和蹇人鹏，以及四川大学的鞠天铭。

张参谋讲述军队的内幕情况

在联大工学院时，温广才和钱泽球是“喷火体育会”的中坚，我是“铁马体育会”的成员，我们都热爱篮球运动。到曲靖汽车学校后，在工余时间便常到营房内的篮球场上参加打球，于是结识了 48 师的张参谋。由于彼此谈得很投机，张就常在晚间到我们的房内闲聊，无所隐讳地谈了许多他自己的作战经历和所了解的军队情况，对我们这些原先对此一无所知的年轻学生来说真是大长见识，下面择要记叙一些：

1. 军队吃空额的现象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由于物价腾涨而拨给部队的经费又远跟不上，各级军官为改善自身的生活便采用

吃空额的办法。名册上每一师的足员名额应该是一万多人，而实际上只有四五千，差额人员的口粮和军饷就由各级军官分享；对士兵本应得的一份并不克扣。按例军政部每年要派人至各部队点名，遇到这种情况便临时抓人充顶，或从友邻部队借人应付，点名后再放回去。上级对这套把戏并非不知，但彼此心照不宣。

2. 第五军在军队中享有特殊待遇，对它拨发的经费不是固定而是实报实销，所以第五军没有吃空额现象，每个师都是满员的；仅此一项，他的一个师抵得上其他部队一个军。第五军有直属的汽车团，全军官兵连同装备可以由汽车快速调动，所以在1942年入缅远征时能迅速在缅甸中部同古地区集中，担负起主要的作战任务。担任左翼防卫的第六军则要徒步行军，先头部队已跨过国境，后面的部队还未离开昆明，一个军拉长至1000公里，以致指挥机构无法掌握；加上军队素质差，指挥无能，结果一触即溃。右翼英军又背信弃义擅自撤退，使日军得以迂回包抄，占领后方重镇曼德拉，陷第五军于重围。当时第五军仍士气高昂，打算孤军血战，但蒋介石和杜聿明不愿意使这支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下令抛弃所有重装备，穿越原始森林回国。撤退途中得不到任何接济，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遭受到蚂蟥虫豸以及热带病的侵袭，以致死亡枕藉，除一部分西去印度组建了新一军外，翻越野人山回到云南的只有两三千人，张参谋便是其中的一员。当时的第五军就是在这些人的基础上重新组建起来的。它下辖三个师。主力师为200师，师长邱清泉，行伍出身，战斗经验丰富，作战勇敢果断，但脾气暴躁看不起军校出身的。其次为96师，师长罗又伦，学问很好，是员儒将。排在最后的才是48师，对它的师长郑庭笈，张参谋却未敢评说。

3. 4月中旬，48师补充了一批新兵。这些新兵的样子真是惨不忍睹，个个蓬首垢面，瘦得像皮包骷髅一样，连站都站不住。张参谋说这都是由兵役制度造成的。征兵工作由各师管区负责，为了防止抓来的“壮丁”逃亡，规定对“壮丁”必须押送跨越两个

省至接收单位。而在押送途中兵役部门大肆克扣口粮，以致“壮丁”十之八九倒毙途中。国民党政府的这种黑暗的兵役制度，最终导致它的军队战斗力低下和它在大陆上的覆没。到达48师的新兵在第一周每天只能喝点粥，第二周才能吃些饭，每天吃吃睡睡，要调养一个月以后才开始上操，进行队列训练。

修理组的工作

3月上旬我调到修理组的车架小组工作，开始有四个星期的假期。我利用假期去昆明看望了在中央机器厂工作的三哥和联大同学，还在旧书店中购到一本龙门书店翻印的，1940年版本美国戴克汽车百科全书，真是收获不小，令人喜出望外。回到曲靖后便与同学们一同细心研读，收益极大。这使我联想到，如果年初就有了这本书，开始工作时肯定会顺利得多。

4月上旬汽校新的一期开始，曾英和温广才分在引擎小组，钱泽球和我则在车架小组，与我同组的美国教官是尼古拉中士。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五个兵种（步、骑、炮、工、辎）中，步兵是对文化素质要求最低的，而辎重中的汽车兵却是要求最高的。美军则相反，往往将最优秀的人派去当步兵，派到汽车部队则反而排在后面。这是由于美国人个个都会开汽车，对汽车多少懂一些，不识字的美国兵可以找得到，不会开车的美国兵却难找到。此外美国人认为作战第一线的人最重要，所以派一名中士来当教官就毫不稀奇了。修理组的中国学员分成四个小组，两个在引擎组，两个在车架组。五个星期后引擎组和车架组互相对调，完成全部的教程。

三不管的翻译官

前面讲过，译员的行政关系在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云南省的

译员则统归外事局的昆明办事处管辖。但是除了对几所固定的训练中心的译员昆办能按时发放薪饷外，对分散在外地县各部队中工作的译员，办事处失去掌握，自然也不能及时发饷。这样终于在2月份发生了一桩悲剧，一位在滇南部队中工作的译员由于几个月没有拿到薪饷，就专程回到昆明向办事处索讨，办事处工作人员说钱款早已汇出而拒付，双方于是发生争执，该译员气愤之下当晚便吊死在办事处门前的树上。这件事在昆明的译员中引起轩然大波，办事处被捣毁，办事处人员四处逃散。

由于译员的工作是由美军总部调派的，随美军而流动。随着战事的进展，美军各小分队的调动更加频繁，外事局根本不知道所属译员现在何处。于是美方有意将译员置于美军编制之下，但中方没有同意。后来的折衷方案是，译员的工资由所在美军单位按月发给，然后在两国政府间的租借法案和反租借法案中结算。记得后来由美军代发薪金数额，按当时的黑市汇率计算约合每月20美元。译员不直属美军无疑对工作是有利的，这样译员的独立性可以强些。工作时当遇到美方不礼貌时，可以拒绝翻译或提出抗议，甚至可以甩手不干，回昆明请求另派至其他单位工作，美军因而就不能不对译员客气一点。如果译员属于美军的编制，情况自然会大不一样。

至于译员与有工作联系的中国部队或单位的关系，一般都非常融洽。既然美军被当作上宾看待，配合工作的译员自然也是客卿了，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仅止于此。由于这种三不管的情况，就形成了一个卓然超脱的译员群体。在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年龄、文化程度和思想均相差不多，即使在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中相遇，原来陌生的人也会很快熟识起来，大家都不以译员工作当作终身职业，相互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所以都能互相帮助，立场一致。